

“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

——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论析

李 帆

【摘 要】清季民国之时,学界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较为充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清学史论述成为主流,那些代表某一特定立场的著述却很少被关注,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就是一个典型。《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撰述,不仅有突出的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色彩,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罗振玉固有的文化、思想理念以及对民国学风、世风的不满,回应现实的意味浓厚。相较于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相关著述,《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坚守中国学问体系,以固有学术立场解析清代学术,西学成为排斥对象,与罗振玉的早年作为和交汇中西的其他专业著述颇为相异,这是他出于自身的文化、学术立场之考量而有意为之的结果。

【关键词】“遗老”;清代学术史;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

【作者简介】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文化史(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2.1.89~99

清季民国之时,学术史一度成为显学,尤其是清代学术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所以如此,西方学术体系整体进入所引发的本土回应是关键所在,以梳理和总结清代学术史的方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讎通义·序》),应对前所未有的学术嬗变,不失为非常可取的思路和做法。清季民国学者对清代学术演进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其成果在文本资源、研讨思路、体裁体例、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构建起一定的研究范式。近年来,学界总结过清季民国学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的清学史论述,并对当时的清学史研究范式作过初步归纳。^①但由于所涉研究对象相对狭窄,未能将不同立场、流派的学人皆包容进去,故所归纳范式和所得结论时有以偏概全之弊。实际上,清季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之时,热衷于清学史者还大有人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著述固然十分突出且影响深远,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也非完全不

能等量齐观,尤其是那些代表某一特定立场的著述。遗憾的是,此类著述很少被关注。在这方面,自居“遗老”^②的罗振玉的作品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非常值得作为个案进行讨论。^③讨论这样的个案,不唯可以展示清代学术史的多重面相和丰富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识,而且对于思考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会提供一个极好的范例。

一、政治认同前提下的清学史书写

作为清季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校勘学等领域贡献卓著,他对甲骨文字的考订与传播、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保存、敦煌文卷的整理、汉晋木简的研究、古明器研究的倡导等,均有开创之功。然在这些显赫的学术成绩之外,他所做的一项工作——书写清代学术史,却因多种因素而被忽视,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名家。实际上,和同时

代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一样，罗振玉的学术也是承清人学问而来，清代学术为其奠定了基础，他不可能不关注自身所由出的清代学术的面貌，并力求对之做出自己的总结。于是，在其学术生涯中，他不时提及清代学术的影响，晚年更是直接对清代学术的演进历程进行系统梳理，这就是1930年问世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

进入民国以后，罗振玉政治身份上属清朝“遗老”之一员，但在1927年6月王国维故去后，逐渐失宠于溥仪。1928年底，罗氏告别溥仪，从天津迁居旅顺。到旅顺后，由于小朝廷的政治事务减少，他有较多时间投入学问中，一方面“闭门不通人事，仍以著书遣日，三年间复成书十四种，四十余卷”^④，另一方面应邀讲学，1930年春，他应日本学者松崎鹤雄之邀，讲授清朝学术源流概略。^⑤松崎鹤雄是以大连中日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罗振玉讲学的，所以罗氏《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讲稿之最初面世，也是由该协会同年出版发行的。1933年，罗氏又将《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收入《辽居杂著乙编》印行。全书近三万字，由《古今学术之递变》《本朝学术之渊源》《本朝学术流派》《本朝学者之研究方法》《本朝学术之得失》五章构成。松崎鹤雄则将《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讲稿译为日文，并加以详尽的注释，于1931年初同样由大连中日文化协会出版发行。这部日文本讲稿题名为《清朝学术源流概略》，全书仅四章，无《古今学术之递变》。^⑥

研读《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首先予人深刻印象的就是其明显的清朝“遗老”印记。该书问世于1930年，然标题仍为《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罗振玉的政治认同立场昭然若揭，这在当时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论著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罗氏是学术研究的多面手，在金石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校勘学等领域都有突出建树，而这些领域具有超越色彩，现实性不强，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没多少关联。所以，罗氏在这些领域的成果皆属纯学理性的探讨，一般不涉及政治纠葛。但史学领域则不然，特别是清代历史，它关联的是民国年间具有政治、文化遗民身份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绝非一段已经结束的王朝历

史。在罗振玉这样视“民国乃敌国”^⑦之人眼里，清朝仍为“本朝”，梳理清朝学术源流，实为总结“本朝”学术演进历程。不仅标题如此，内容也多显示“遗老”特色。如谈“本朝学术之渊源”，即清代学术何以兴盛和发展的缘由时，罗振玉总结了九个因素：“圣学圣制、开著作馆、搜辑遗书、校刊经籍、颁布群书、举行特科、奖励宿学、振兴书院、内府搜集古器。”^⑧无一不是从清廷文化政策如何有助于学术发展着手，将学术的繁荣归结于朝廷的鼓励，尤其强调皇帝的表率作用：“凡钦定之书至数万卷，盛德大业为亘古所无”，并将“御制、钦定各书”按四部顺序列表出之，成为书中核心内容之一。^⑨而于众所周知的文字狱对清代学术产生的影响，罗氏则一语未提，即全然回避清廷文化政策的负面因素。与之相较，在讨论清学特色，特别是出现考据学一枝独秀的缘由时，清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民初的梁启超都认为清廷所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是一根本因素。此外，在评价清代学术成就时，罗振玉也以“钦定”“御纂”之书作为最佳标准：“本朝钦定诸经注，皆汉、宋兼采，折中至当”^⑩；“康熙以后，凡言律吕者皆根据御纂《律吕正义》，盖圣祖于乐学至精，后有作者，莫能外也”^⑪。这种论调与章太炎等人的评价截然相反。在章太炎看来，凡是清帝“钦定”“御纂”之书，往往低劣不堪，他曾评论康、雍、乾三帝纂修七经，称其“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澧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⑫。可以说，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截然对立的判断。

扩而言之，罗振玉的这种表达并非个例，它反映了民国时期“遗老”们的共同取向。与前代遗民相比，以罗振玉为代表的清“遗老”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代遗民。他们身处民国，在共和体制下怀想帝制，和明初、清初的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法像清初遗民那样坚守“夷夏之别”，只能把“忠君”作为第一准则，讲求“君臣大义”。清遗民劳乃宣就说：“为人臣者，不二于君，此宇宙通义也。”^⑬在这方面，《清史稿》的纂修是人所共知的例子。当时参与撰稿者多为具有“遗老”身份者，他们力求通过《清史稿》表达自身的认同，最初甚至欲将本纪中的“宣

统纪”拟为“今上本纪”，但随后不得不改动。^⑩他们在纂修皇帝本纪时，不吝溢美之词，“至勤”“至名”“至仁”等歌功颂德的形容词处处可见。罗振玉将清学之繁荣归因于皇帝之引领的表述实与其如出一辙。他们还站在忠贞于清朝的立场上，“不奉民国为正朔”，在书中对民国人物肆意贬斥，以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徐世昌主持纂修、完成于1938年的《清儒学案》，也在为清廷歌功颂德。徐氏虽做过民国大总统，但仍念念不忘清室，总在寻机报先朝知遇之恩，具有典型的文化遗民心态。他在《清儒学案》序文中明确指出：“有清圣祖仁皇帝，以乾德之中，躬儒素之业，少而好学，至老而不休，御经筵者四十年，成图书者万数千卷。观摩朱子之言，撷其纲领推其说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圣祖之教，涵育于二百余年者，信而有征矣。凡斯举譬，并取宏规，自余诸家，各随所造，犹之泰岱之接徂徕，大江之纳汉水。”^⑪这无异于将清代学术的源头和发展皆归功于康熙皇帝，与罗振玉将清代学术的繁荣归结于朝廷鼓励和皇帝表率的观点相一致，同样具有“忠君”色彩，系在“君臣大义”下做文章。而且《清儒学案》是其时极少的带有“遗老”色彩之总结清代学术的著作，它与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相配合，恰构成一类特殊的清学史论述。

关于清季民国时期的清学史论述，有学者曾归纳出多种研究范式，如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⑫实际上，不论哪种范式，都与立说者立说时所处语境和所持立场息息相关。章太炎、刘师培曾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民族主义者，立志“排满复汉”，其学术论说必然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梁启超、胡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建构“理学反动说”，并将之和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的说法相配合；钱穆是因不满意梁启超的论述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并以宋学为导向，用“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释清学史；侯外庐则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社会史为基础，结合社会思潮，对清学之兴起提出自己的主张。由此类推，作为

政治上认同前朝、视“民国乃敌国”的罗振玉，以“遗老”立场书写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似也代表了一类清学史论述，虽谈不上是一种范式，但至少丰富了民国时期的清学史研究类型。今日看来，罗氏政治立场自不可取。不过他能相对系统地总结清廷文化政策有助于学术发展的具体要素，引人进一步思考学术发展的语境问题、学术与政权建设的错综复杂关系问题等，从而启示人们需在政与学的制高点上考量，才能深入研讨清代学术史或全部中国学术史。仅此而言，罗氏之作还是有其探讨空间和价值所在的。

二、文化认同与现实理念的独特表达

以罗振玉为代表的“遗老”们，除政治认同方面有自己的立场外，文化、思想上往往也有自身特色。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撰述，不仅在政治上有突出的“遗老”印记，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固有的文化、思想理念以及对民国学风、世风的不满。

一般而言，学术史是反映不同时代学术发展进程的专门研究领域。但何谓“学术史”，其内涵和外延、对象和内容一直呈现不确定性，学界至今仍是歧见纷呈，特别是如何处理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不少学者往往先存一定的文化、思想理念，以此作为写作学术史的前提预设。在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这一特点也很明显。他在叙述自己为何要应约讲授“本朝”学术史时，说过这样的话：“东北文化会请予讲考古学，予意有清一代学术昌明，义理、训诂兼汉、宋之长，中叶以后偏重训诂名物，不能无失。至于今日，人伦攸斁、圣学垂绝，非讲求三千年精神文明，不能救人心之陷溺。乃为讲本朝学术源流派别。”^⑬可见，其讲学活动绝非单纯的学术交流和研讨，而是出于自身思想理念、有浓重现实意味的举动，即对所处现实尤其是现实中人伦、学术状况的极端不满，使得他必须要出面匡正。由此出发讲授的学术史，必然会借学术之名浇心中块垒，这在所讲内容上就有明确体现。在回顾清以前的中国学术演进历程时，罗振玉对历代学术做出自己的评判，其所运用的评判标准为“尊儒重道”，即“儒者之道，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人类一

日不灭,圣道一日不亡也”。^⑧用此标准对历代学术进行衡量,所写出的显然非单纯的学术史著述,而是思想史统率下的学术史,可谓思想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其现实用意极为鲜明。

无独有偶,徐世昌在谈及他何以要纂修《清儒学案》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

夫经正民兴,斯无邪。顾盱衡斯世,新知竞沦,物奥偏明,争竞之器愈工,即生民之受祸益烈。狂澜既倒,孰障而东?世昌曩在京时,辄欲以圣贤意蕴提倡流布,置邮于远方,侧闻欧美才俊,久尊孔教,名区巨镇,多建中国学院,广运书籍,争事研摩,文治大同,辉映坛坫。此以知崇儒重道,遐迩同风,矧生为仲尼之徒,宁可舍本逐末哉?《记》有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吾国三百年来名儒辈出,远绍宋、明……窃不自揆,谨撮举其言行著作,钩玄提要,汇为一编,以继梨洲二书之后,愿与当世学人共相参考。俾知学术为天下之公,殊途同归,咸主于有用,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冀以端本善俗,范围曲成。凡属斯民,各尽其天畀之聪明,尊所闻,行所知,皆优游于礼让道德之中,用臻一代文明之盛,岂不懿欤!^⑨

这样的说辞,一方面呈现出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视现实为纲常伦理失序之世,和一些“遗老”深觉民国时局如同历史上的五代乱局、民国为“五代式民国”的思路相一致;另一方面提出解决之道是通过“崇儒重道”,“冀以端本善俗”,恢复旧有的纲常伦理和精神、文化秩序,达于“一代文明之盛”。而清儒之学行恰能起到“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的作用。故继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后,纂修《清儒学案》,且基于黄氏的明遗民身份,仿其所为的思路和意蕴也是不言而喻的。可见,徐世昌修书的基本意图和罗振玉之作《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基本一致,思想性、现实性非常强,绝非单纯为清儒立传。

徐世昌所组织编纂的《清儒学案》,主要参与人员有夏孙桐、张尔田、金兆蕃、王式通、朱彭寿、沈兆奎、曹秉章、傅增湘、闵尔昌等,其中不少为北洋旧人,多属情感或精神上的清遗民,与政治形态上的清

遗民桴鼓相应。他们在个人出处上已不能守遗民之节,传统遗民伦理的约束力愈发淡然,但固有观念的强大力量仍支配着他们,治统失求道统。虽然不再在政治上“守节”,却要在文化认同上“守节”,通过“崇儒重道”坚守文化“正统”,以达成文化遗民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意识在兼有政治、文化遗民身份的“遗老”罗振玉那里同样存在,其对顾炎武的评价最能说明这一点。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里,罗振玉最推崇顾炎武之学,所以如此,是出于其评鹭历代学术的标准为“尊儒重道”。而他眼里的顾氏之学即“师儒”之学,是“尊儒重道”的典范。他说:

明季大儒顾亭林氏有言:自古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以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氏所谓匹夫有责者,师儒是也。其界说本自明白,君子素位而行大义,名分不敢稍越,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有德无位,不敢作礼乐,以孔子之至圣,亦祖述先王之道以法后王已耳。其因鲁史作《春秋》,尚以褒贬有出位之嫌,而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妄人遂以孔子为素王改制,其犯上作乱者至引亭林氏“匹夫有责”之言为口实,皆名教之罪人,大悖师儒之义者也。^⑩

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做如此阐发,恐怕当时和后世都不多见,把“匹夫有责”释为“师儒”,强调“君子素位而行大义,名分不敢稍越,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实际是把“忠君”作为第一准则,讲求的是“君臣大义”。充分表明罗振玉意欲将“尊儒重道”这一评判学术的标准落实到现实中,由此把当年康有为所倡“素王改制”和其后革命者的“犯上作乱”,都视作“名教之罪人,大悖师儒之义者也”,其以学术史论表达思想观念的用意昭然若揭。

进而言之,罗振玉之推崇顾炎武,还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心态在作祟,即以清遗民自比明遗民。这也是当时“遗老”们的共同心态。^⑪实际上,顾炎武将“亡国”与“亡天下”区分开来的表述,是在说对于传

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就像有学者所言:“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渐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②而对于纠结于一家一姓之亡却又无可奈何的清朝“遗老”们而言,这样的说法在文化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生存借口,也在学术上为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当时不少“遗老”不愿多过问政治而是投身于学问之中,与其具有得自顾炎武的如此信念有关。至于罗振玉对顾氏之语的解析,恐怕更多体现了既热衷小朝廷政治,又不忘问学的那部分人的态度,力图在政、学两边都获得一种现实合理性。与前代遗民不同,罗振玉这样的“遗老”是身处共和制而怀念帝制、身在民族国家而怀念王朝国家的一代。他们口头虽自称还拥有政治上的正统性,^③但在共和制已被普遍认同的时代里,无奈中只能转而在文化认同上寻找出路。对于明遗民而言,“夷夏之别”是其精神支柱。在“夷夏之别”的两个层面里,“礼别夷夏”一般占据主流,但当异族入侵导致朝代更迭之时,地域、种族之分的“夷夏之别”就狂飙突起,成为前朝遗民反抗异族统治的精神武器。明遗民在清初的活动即基于此信念。到清遗民那里,身处的历史语境已迥别于明遗民,清季的“反满”革命者借助民族主义兴起的潮流,大打“夷夏之别”旗号,从事“排满复汉”的宣传与实践,最终取得“反满”革命的成功,使“满清”政权丧失了正统性与合法性。民国时以汉人为主体的清遗民如果继续忠于这一政权,就会受到不认祖宗、忠于“异族”的指责,从而背负起巨大的道德包袱。在这一情形下,清遗民更愿讲求“夷夏之别”的“礼别夷夏”层面,再次像雍正等皇帝所反复申明的那样,强调“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借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标榜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这样的逻辑下,清王朝成为旧文化及体制的载体,清朝皇帝成为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的象征,甚至可以成为超越具体王朝国家之文化集合体的“天下”的象征。

罗振玉一再申说清朝皇帝的文化贡献和学术引领作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种逻辑。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则成为罗氏论调的注脚。

实际上,不仅罗振玉,王国维1917年作《殷周制度论》,亦有将政治和文化结合以重建理想秩序之现实用意。他就《殷周制度论》致信罗振玉:“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④同样是借比拟顾炎武(按学者尊之为亭林先生)来表达自身的政治、文化追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罗振玉之表彰顾炎武,是易得“遗老”之共鸣的。作为“遗老”个体,每个人的人格、遭际、命运皆不同。对于王国维这类文化遗民人格强于政治遗民人格之人,清朝、清帝已不单是一个政治上的王朝和帝王,更是一种文化象征。清朝灭亡犹如顾炎武所言之“亡天下”,故后来王国维之自尽,被陈寅恪认为殉的是中国文化。而陈氏所定义之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君臣之纲”“朋友之纪”上,^⑤故王国维也是“一死从容殉大伦”。^⑥这里将中国文化与君臣之伦合一而论,切中了王国维这类“遗老”的要害,可谓深具“了解之同情”之论。罗振玉推崇顾炎武式的遗民,实则也是有精神相通的因素在起作用。

此外,从罗振玉对顾炎武之后的清人治学方法、学术得失的评价中,也能够看出其基于自身理念的倾向性。他说:“本朝学术固由于国家倡导,而考其师承,则导源于顾处士炎武。处士之学在明体达用,而绍其学者,亦得其半而已。顾氏之学,始传吴中,传皖江,已复传于江苏,并光被他省。虽嘉庆以前,国家平治,海内安晏,致传顾氏之学者,不复留意于致用,而于经史考订绍述甚广。”^⑦即清代学者仅继承了顾炎武学术之半,于致用方面有亏。也就是说,罗振玉心目中的学术典范是“明体达用”的顾炎武之学,顾氏之后的学者偏于一边,令他不满意。在《海宁王忠愍公传》中,罗振玉也表达过此类意思,说王国维起初“自以所学根柢未深,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他则“谓江氏说多偏驳,

国朝学术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②他对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评价以及刻意强调清代学术“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同样说明他对“明体达用”的顾氏之学的大力推崇和对江藩崇尚的所谓纯粹汉学的不满。这实际牵涉治学中如何处理训诂、义理之关系的老问题，也是清学史中的核心问题。罗振玉推崇训诂、义理并重的汉宋兼采之学，认为“本朝经学，钦定诸经一承宋儒之旧，而兼采汉儒以下诸家之说，训诂、义理并重，一扫门户之习”^③。“乃后来诸儒，悉贵汉而轻宋……今日士气消沉，不能不归咎于重训诂、轻义理。”^④从学理上讲，训诂、义理并重自然是治中国学问的正途，这样的主张是非常合理的。但罗振玉此时说此言，则非为简单地谈治学理路，而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在他讲《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1930年前后，以新派为主导的学界主流正在大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大力肯定清人考据方法，使考据学风笼罩学坛。在这方面，梁启超对清代考据学的赞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指出，考据学之“无用”体现出纯正的学术精神，“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归根结底，“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⑤这种情形，引起罗振玉和文化遗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各异。罗氏通过讲述清学史的方式，立异于梁启超。他在梳理清人“贵汉而轻宋”的治学历史后，得出“今日士气消沉，不能不归咎于重训诂、轻义理”的结论，不啻是对现实的一个明确回应，实则仍是希望将学术作为“救人心之陷溺”的工具。而他对“钦定诸经”及顾炎武“明体达用”之学的高评价^⑥，则是其固有立场的体现，即仍把“尊儒重道”作为评判学术的最高准则。

罗振玉借讨论清学之机表达现实理念，还体现在其对待今文经学和康有为的态度上。他说：“道光以来，学者复舍东汉而师西汉，先是有常州庄述祖、刘逢禄讲《公羊》之学以造其端；厥后学者从风而靡，

变本加厉。至光绪中叶，遂有倡素王改制之说者，恶诸经之害己，诋为皆出刘歆伪造，惑众诬民，流毒至今。”^⑦由此可知，他对清今文经学是相当反感的，对康有为等的托古改制之说尤为不满，和他评判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对康有为的指斥相一致。无独有偶，徐世昌对清今文经学也持贬低态度，说：“道咸学者，思驾东汉而上之，有所谓微言大义之学，微言则强六经以就我，大义则颇矫异于宋儒，陈义甚高，张之别帜。”^⑧与罗振玉之论相唱和。钱穆同样亦对康有为评价不高，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议论道：“‘新学伪经’者，谓东汉以来经学，皆出刘歆伪造，乃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其书亦似从乾、嘉考据来，而已入考据绝途……乃以牵涉于今古文家法，归罪于刘歆，若乾、嘉汉学源流皆在歆，非无根不经之谈乎！”^⑨徐世昌为文为学颇崇桐城、理学和颜李之学，钱穆也对宋学情有独钟，两人在“尊儒重道”方面皆与罗振玉有共鸣。他们不满今文经学及康有为，背后恐有道统论的因素在起作用，即讲求理学道统，反感康有为等人“微言则强六经以就我，大义则颇矫异于宋儒”^⑩的“无根不经之谈”。对罗振玉而言，指斥康有为还有一重政治上的因素。罗在清季政治变革中是靠近张之洞等人的，属于所谓稳健者，对康有为的“怪诞之言”“新奇之论”及其失败后在海外的政治活动（他们认为是陷光绪帝于大不利的活动）非常不满。所以，尽管进入民国后，康有为也算是“遗老”中的一员，但罗振玉仍将其维新变法时所倡的“素王改制”和其后革命者的“犯上作乱”并列，都视作“名教之罪人，大悖师儒之义者也”。^⑪不仅如此，对于康有为等所引领的疑古之风，罗振玉亦深表不满，认为“疑古信今”是清代学术特别是“近三十年”学术之一“失”，“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珉珉”。^⑫考虑到罗振玉演讲《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时间和语境，这显然是对清季民初以降之学术的负面评价，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疑古思潮和“古史辨”运动的不满，表明其与民国新派学者所主导之学风格格不入。

罗振玉所生活的时代，文化遗民并不少见。这

些人虽不见得个个都在政治上认同清王朝,但在文化理念上往往有相通之处,即皆把纲常伦理和文化秩序看成兴亡根本,感怀于民国之“礼崩乐坏”,从而对现实极为不满。就像章钰在书信中所言:“一姓兴废,本天道之适然。独恨立国五千年,凡夫制度,文为声名,文物所以殊异夫遐裔而自别于禽兽者,无不颠倒摧毁,随之而尽。”^⑩这些人常以结社修楔、诗文唱和、撰修方志、书信往还等方式抒发情怀,但于学术著述中表达立场者相对少见。至于以梳理有清一代学术演进历程的方式表现文化态度的更是极为稀少,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和徐世昌《清儒学案》算是两个特例。不过《清儒学案》限于体例,还难以称得上是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史,罗振玉之书的代表性和特有的文化价值于此就相对突显出来了。

三、以固有学术立场解析清学

罗振玉是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文史学者的研究特色,即一方面继承和拓展了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另一方面运用西学新知,使之与中国学问相交汇,从而令文史之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他在考古学、金石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等领域的成就以及他对王国维治学的影响,都体现出这一特色。可以说,在中西学术交汇的清季民初,他的研究成果处在学术前沿,甚至起着学术引领作用。但在1930年他讲《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时,坚守中国学问,基本以中国固有学术的立场来解析清学,西学似已成其排斥对象。这与他在清季之时引入西方农学、兴办西式教育、编译西书等作为,恰成鲜明对照。

总结清代的学术成绩,是《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主干内容。书中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顺序介绍各部成绩,然总标题却冠之以“本朝学术流派”之名,即在罗振玉心目中,所谓学术流派,大约是指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以及四部之学的内部派分。他在“经学”目下设《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孟子》《四书》《尔雅》、群经总义、小学、乐等分目,大体依十三经顺序并结合经学相关内容而叙述。其中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目下按派分述,如说《易》学分汉学派、理

象折中派、义理派、辟陈邵图书派,《尚书》分今文派、不分今古文派、古文派,《毛诗》分汉学派、无专主派、齐鲁韩遗说派,《三礼》分《周礼》《仪礼》《礼记》三派,《春秋三传》有统治《春秋三传》及分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之分,余者则仅列清人研究成果之书目而已。“史学”目下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及载记、传记、谱录、地理八类分别叙述,每类下出以研究成果之书目,并未涉及流派之分。“子”目下按儒学、诸子、考证、算术四类分述,儒学实际谈的是清治义理学者的成就,考证谈的是考据学者考经书之外诸群书的成就。“集”目下按《选》学、编集、辑注、诗文评四类进行叙述,分别罗列相关成果的书目,“子”“集”两目亦均未涉及流派之别。^⑪总之,罗氏书中讲流派者仅及于经学,余则多为清人研究成果之书目,且经学分派只集中于《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目下,而其所谓“流派”亦仅是指经学今、古文或汉学、义理(宋学)等派分以及经书之派分。

依照现代概念,四部分类和相应的书目罗列以及经学、经书的内部派分,似不应称之为“学术流派”,而且罗氏所界定者与当时学界主流所述之清学流派也不在同一概念层次上。今古文、汉宋学之分是了解清代学术的前提,清儒所治之学基本都关联着今古文、汉宋学问题。学界主流实际是在这一前提下,以地域、师承、学术取向、学术主张等划分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等清学流派,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皆如此。所以,罗氏所言“学术流派”仅是其自身的界定,与通常认知中的清代学术流派是有较大距离的。当然,“学术流派”是个舶来品意味颇浓的概念,民国时的文化遗民似乎不太情愿以“学术流派”或“学派”概念梳理中国固有学术,如李详对“学派”之分便很慎重,似乎不太赞成“学派”的说法。他曾以《说文解字》对“派”字的诠释证明:“派”,“异于正源,本非雅词”,“古有师法,无所谓派者。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一时之好尚,未为定论”。“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⑫或许罗振玉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愿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人心目中的学派概念界定和梳理清代学术,而是仅取“学术流派”之名,实之

以版本、目录、内容基础上的四部分类和经学、经书之内部派分。

进而言之,《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所谈的“本朝学术流派”实际具有浓厚的目录学色彩,很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类的著述。显然,罗振玉虽徇俗使用了“学术流派”一词,而其心中所遵循者仍为传统学术理念。在当时的清学史著作中,这样的表述方式自然是守旧的,但也不能不说,它所提供的清人治学成果的大量书目,显有罗振玉个人治学数十年的雄厚积累作根基,不仅系统完善,而且定位准确,重点突出,对于治清学者不啻学术导引,裨益良多。当然,由于罗氏是在传统目录学框架下讨论清代学术,而这一框架在学术史书写中是有局限的,故其书的弱点也就体现为对清学史基本是静态展示,呈现共时性特征,而非动态书写,既未将清代学术演进历程划分出发展阶段,也未将清代学者及著述按历史时序区分。这样的叙述缺乏历史感,较之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乃至皮锡瑞的同类著作的论述,显然逊色得多。章太炎的《清儒》、刘师培的《近代汉学变迁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皆对清代学术演进历程划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结论对后人理解清代学术史影响深远。这里的高下之分,恐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著述理念的差异。

众所周知,清季民初是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所谓“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即中国固有学问体系向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的转换就是在这一时期。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在撰学术史著述时,都有用西学学科术语、概念比附中国学问之处。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就以西学为参照系,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教育学、理科学、哲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等西学分科术语分类阐述先秦学术;王国维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中,用哲学概念梳理戴震、阮元之义理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多用哲学、文学、科学等术语阐发清代学术成就。成书在刘、王、梁等人之后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却在学术分类上严守中国目录之学,几无西学痕

迹,较为典型的是书中对金石之学的定位。罗振玉乃近代金石考古之学大家,这方面的卓越成就为学界公认,所以他在论及清代学术时,对己之所擅的金石之学格外重视。如对清“学术渊源”总结的九条中,专有一条是“内府搜集古器”:“搜集三代礼器,始于宋之皇祐。本朝乾隆中,命儒臣将内府所藏古礼器,编为《西清古鉴》正、续编及《宁寿鉴古》。当时士夫承流鬯风,斯学遂盛。其文字可考证经义,其形象可正礼图,故程氏瑶田据以释《考工》,吴大澂据以考古度量权衡。晚近山川之宝日出不穷,礼器以外,若殷墟之甲骨、西陲之简牍、中州之碑版,均为前人之所不及见,有资于考古甚巨,其风实自上开之。”^②他虽然看重金石学的成就与地位,但仍将其归入“史学”的“谱录”类中,和“书目”“姓氏年谱”两类并列,^③而非将其和西方引入的近代考古学相关联。^④也就是说,在介绍清代学术成绩时,罗振玉心目中的金石学仍为传统意义上史部之学里的小类别,连“晚近”发现的“殷墟之甲骨、西陲之简牍、中州之碑版”也包含在内,罗氏学术史著述中学术分类观念之守旧和与时代之脱节,于此可见一斑,一如其政治立场。

实际上,罗振玉并非不了解考古学等西方舶来之学,他所引领的学术潮流和对当时学界的重大影响就在金石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等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领域里,他所交往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也皆为西方考古大家,他的专业学术著作中亦不乏一些考古学的内容,而且如前所述,松崎鹤雄等邀他讲学,本来是想请他讲所擅长的考古学。但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这样总结清代学术的著作里,他刻意不谈考古学等西学系统下的学问,不以西学分类回溯和评判清学,甚至提到西学东渐的地方也仅有一处,且出之以负面评价:“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其实近日欧洲新说,皆为中国古代过去之陈迹。”认为崇信“外来之新说”,是学界“近三十年之失也”。^⑤全然不同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论清学史时对晚清以来之“新学”的关注和评价。^⑥也许进入晚年的罗振玉出于思想惯性而渐趋守旧,不似早岁之追寻新潮,但从其谈论清学史以外的专业著述看,又很难说他

如此。恐怕只能认为他是有意为之,出于自身特有的文化、学术立场的考量。具体而言,在一些清遗民眼里,传统的式微、西学的猖獗直接导致清朝覆亡,民国乱象之根源亦在西学,“今日之伦纪荡尽,邪说横行,民生况瘁,未始不由崇拜欧美学说变本加厉所致”^⑧。1914年至1918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更使得他们认为,讲富强民权却不讲礼乐教化的西学必将世界带入历史深渊,富强民权或可在较短的历史时段内实现,但收拾人心的礼乐教化则须待之百年。罗振玉据此言道:“今且赤县崩沦,礼亡乐斁。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顾汲汲为此,急若捕亡。揆以时势,无乃至愚,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夺。”^⑨富强与礼教之辨,成为“夷夏之辨”的新表现。^⑩基于如此理念,晚年的罗振玉坚守中国学问,以中国固有学术的立场解析清学,自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进而言之,除文化、学术立场的因素外,在如何体会中国固有学术方面,罗振玉恐与民国时的“老辈学人”^⑪亦有相似的看法。1923年1月,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新派学者整理国故的一系列主张。“老辈学人”宋育仁随后予以批驳:

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所言皆是认书作学,真真庄子所笑的糟粕矣乎。今之自命学者流多喜盘旋于咬文嚼字,所谓旁收博采,亦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动辄斥人以陋,殊不知自己即陋。纵使其所谓旁收博采非目录类书的本领,亦只可谓之书麓而已。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⑫

宋育仁之意,实际是指责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仅将中国学术视为客观研究对象,以西学眼光看中国学术,而非将中国学术理解为具有“大义”“微言”的安身立命之学。若依此判断,则中国学人研究固有学术不能以源自西学的纯客观态度出之,而应加入自身体验、主客相融,方能贴近学问本体。与宋育仁一样同为“老辈学人”的罗振玉,对待中国固有学术应该也有类似想法,所以他能以西学眼光引领考古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等其时的“新学”,但在总结清代学术时,还是回归了以中学理解中学的老路,

实则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才能更贴近清学本体。

近代中国处在古今中西相交汇的时代,中西学关系问题是这个时代最难处理的极为复杂的问题。处在这样的语境中书写中国的学术史,是结合西学新知以出之,还是仅凭中学素养、以中学视角来把握,何者更能达成书写目的,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罗振玉以《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书写实践,做出了自身的选择。这里自然有其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立场考量,但对后人而言,若不过分纠结于其个人身份,持相对超越的心态来看,此一文本当为一方的标本,非常值得对之下大气力深入研讨。而且研讨这样的文本,除其本身的内涵值得一再发掘外,附着于上的意义亦需再思三思。

注释:

①如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载《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陈居渊:《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张瑞龙:《学术与世变:20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等。

②“遗老”是个泛称,是自我认同和他者构建结合而一的概念。民国时期,“遗老”既可通指那些效忠清皇室的遗民,也可称谓内心赞同传统学问的老辈士人(或曰文化遗民)。在文化遗民眼里,清皇室不单是政权的代表,也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故文化遗民的认同并非属于政治意义上的认同。“遗老”定义,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的界定,本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民国时期的罗振玉在政治上是清室小朝廷的核心成员,又属文化遗民的一员,为典型的“遗老”。

③李帆《罗振玉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以〈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探讨》(《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在这方面做过一点初步讨论,为本文写作提供了若干基础。

④罗振玉:《集蓼编》,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⑤关于讲学之事,罗振玉自述曰:“戊辰冬,由津沽移居辽东,戢影海隅,意且屏绝人事。今年(按即1930年)春,海东友人松崎君柔甫邀余讲学,请有之上公及蠡庐学部为之介。自维忧患余生,学殖荒落,初未敢承。以二君怂恿,乃勉应以讲

本朝学术概略,而先之以历代学术变迁。”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序》,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⑥按松崎鹤雄在将《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译为日文时,书名改为《清朝学术源流概略》,也许是基于日文本的读者以日本人居多的考虑而有意为之的,并非代表他不认同罗振玉的立场。松崎鹤雄(1867-1949)在华数十年,首先拜的老师就是王闿运、叶德辉,所交往的学者也多为具有“遗老”身份者,如柯劭忞、刘承幹、王季烈(号螭庐)等,请罗振玉讲学也是由王季烈介绍的(罗言“螭庐学部为之介”),所以松崎对民国时“遗老”们的立场应是颇为了解的。另外,《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当时也以其他途径传播,日文本在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的《东亚》杂志上刊载,韩悦以《清代学术源流概略》为题译为中文,发表在1931年出版的《东北丛刊》第18、19期上。

⑦“民国乃敌国也”一语出自郑孝胥日记,表明对于民国的不认同。罗振玉的政治立场与郑相同,故这里用此语。林志宏将“民国乃敌国也”作为其专著的正标题使用。

⑧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4-213页。

⑨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5-207页。

⑩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⑪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⑫章太炎:《诂书·清儒》,载朱维铮编校:《诂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4页。

⑬劳乃宣:《示儿书》,载《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783页。

⑭参见王钟翰:《张尔田师谈清史稿纂修之经过》,载《清史补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⑮徐世昌:《清儒学案·序》,载《清儒学案》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⑯陈居渊:《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⑰罗振玉:《集蓼编》,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⑱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1页。

⑲徐世昌:《清儒学案·序》,载《清儒学案》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⑳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3-194页。

㉑尽管清遗民有比照明遗民的心态,“其实,与清初的遗民大都具有反清意识不同,民初被视为遗老者,虽然也以不仕新朝相标榜,真正要推翻民国恢复满族王朝统治者为数并不占优”。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4页。实际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崛起已然消解了传统遗民继续存在下去的政治和文化根基。在思潮汹涌的时代里,清遗民恪守以君臣大义为基础的固有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不仅与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格格不入,在合法性上与前朝遗民相较,也距离遥远,可谓最孤独的一代遗民。

㉒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㉓罗振玉一直力主帝制,反对共和,经历1917年张勋复辟的失败后,1934年追随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帝国”时,还在说“神州二十余年民生涂炭,皆由帝政改为共和所致”。(《大典谨话》,《盛京时报》1934年3月1日)。溥仪和“遗老”们想通过“满洲帝国”的帝位来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不为日本关东军所允,更关键的是在举国反对伪满殖民政权的现实中,他们所标榜的政治“正统”完全无法得到认同。

㉔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0-201页。

㉕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郗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附唐笈诗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㉖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载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附唐笈诗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㉗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⑳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0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㉑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㉒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㉔罗振玉将清朝皇帝之学和顾炎武之学一体评价,似未虑及顾炎武反清的政治立场。

㉕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240页。

㉖徐世昌:《清儒学案·序》,载《清儒学案》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页。

㉗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2-713页。按钱穆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已以有力证据证明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在学界反响甚大。

㉘徐世昌:《清儒学案·序》,载《清儒学案》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页。

㉙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㉚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

㉛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7-588页。

㉜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4-235页。

㉝李详:《论桐城派》,载《李审言文集》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87-888页。

㉞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㉟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7页。

㊱“考古”一词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里的运用,是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泛指对古典、古事等的考证,如“若殷墟之甲骨、西陲之简牍、中州之碑版,均为前人之所不及见,有资于考古甚巨”等文字中的表述,参见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二是特指“史学”中“地理”类中的一目,说“地理之类约为四目:曰志,曰图,曰水地,曰考古。”参见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这两层意思皆与作为学科概念的考古学不同。

㊲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

㊳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王国维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论著都不乏评述晚清之讲求西学的内容。

㊴罗振玉:《集蓼编》,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页。钱穆亦言:“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恰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自序第4页。可见罗氏之主张,并非仅在清遗民中有市场。

㊵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载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㊶参见陈义报:《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年第4期。

㊷民国时的“老辈学人”是相对于新派而言的群体,“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归于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3页。

㊸问琴(宋育仁):《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1923年第16期。